

抗战教科书的创伤书写

——课本抗战再论

石 鸥, 蒋 宇

摘要:有战争就有创伤。创伤并不必然会成为文化创伤。文化创伤是一个群体(如民族、国家等)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其集体身份、价值观和历史记忆受到严重打击而产生的一种创伤。文化创伤事关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创伤需要被建构被书写,并由一定的媒介所承载与传播。教科书被公认是一种绝佳的媒介。抗战教科书文化创伤书写的基本目标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主要策略包括通过构建“文本共同体”,协同发声,再现创伤事件;利用叙事技巧,努力构建文化创伤的符号话语体系。新时代教科书的抗战书写,应不断增强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构建引领世界话语的中国抗战话语体系、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思战争创伤。

关键词:抗日战争; 教科书; 抗战教科书; 文化创伤; 创伤书写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5)11-0043-08

八十年前,中国人民在抗日战场上赢得了近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胜利。在这场历经十四年之久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中,课本积极参与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表明,抗战时期的教科书是日军最难对付的武器之一。战争既让中国人民显示了巨大的能量,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教科书通过复现、传播和共担创伤,在人们心中篆刻下永久的创伤印记。人们共享创伤记忆,在危机中凝聚为一个坚强团结的抗战共同体。研究抗战时期以共产党根据地教科书为代表的教科书文本共同体,如何将中国人民的创伤有意义地再现并使之成为激发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元素,无疑能对新时代教科书如何书写抗战创伤记忆、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

历史镜鉴。

一、抗日战争、创伤与文化创伤

有战争就有牺牲就有创伤。当战争发生时,创伤就发生了。战争会带来社会的创伤、自然的创伤,尤其是个人肉体的创伤,谁经历了战争经历了创伤事件,谁就会遭受创伤。

创伤一词源于希腊语,原意仅指外部事物给人的身体造成的损伤。今天,人们把创伤看成由各种致伤因素作用于人体所造成的组织结构完整性破坏(生理意义上的创伤,如物理创伤),或功能障碍(心理创伤)。所谓心理创伤,是指个体经历重大痛苦事件(如战争、亲人去世)后所产生的持久的心理伤害,可能表现为焦虑、抑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21 年度国家一般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中小学音乐教科书的革命叙事研究”(BLA210219)。

作者简介:石鸥,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48);蒋宇,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48)。

郁、惊恐、不安等不良反应，这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正常社交、良好生活等功能。真正将生理创伤与心理机能联系起来是在19世纪末，由法国神经学家沙可（Charcot）开启的歇斯底里症（hysteria）研究。后来布鲁尔（Breuer）与弗洛伊德（Freud）进一步认为歇斯底里的症状是创伤的结果。^[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引发的心理创伤研究逐渐展开，并在越南战争后达到全盛。^[2]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Alexander）是创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关于创伤的日常认识称为“常民创伤理论”（lay trauma theory）。根据常民创伤理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事情，损害了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的幸福感受。谁经历了创伤事件，谁就会遭受创伤。常民创伤理论又分为实在论的创伤观和精神分析的创伤观。实在论的创伤观认为创伤来自事件本身，人们对导致创伤的事件认知很清楚，对创伤事件的反应往往是不假思索的但又能清晰地回应，如在地震、火灾等灾难降临之际，震惊、悲恸、伤心等感受是每位理性人直接的创伤反应。^{[3][2-3]}精神分析的创伤观即心理分析的创伤理论，该理论认为创伤不仅与事件本身相关，还与主体受压抑的焦虑情绪有关。心理创伤的开创性人物弗洛依德总结了一套发展模式，认为成年后的创伤是早期被压抑的创伤经验的“无意识”再现。^[4]

2004年，亚历山大等人在《文化创伤与集体身份》一书中，正式提出“文化创伤”概念，发展出“文化创伤”理论，认为当个人和群体经历的事件被他们认为是可怕的，且该事件在群体意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3][1]}

文化创伤理论主要是一种建构主义的创伤社会理论^[5]，它认为无论是实在论的创伤理论还是精神分析的创伤理论，都存在“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文化创伤理论强调创伤是集体性的，创伤事件本身不必然会造成集体创伤，事件并非天然具有文化创伤性质，创伤具有社会调节属性。创伤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而是在特定情境下形成的。创伤事件发生之后，通过再现创伤事件并对其进行意义建构，从而永久性地改变有关共同体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才会生成

文化创伤。即使一个创伤事件对集体造成了损伤，创伤事件的性质若不被集体成员所了解，没有对集体的意义形成根本性的甚至是永久的触动，那么文化创伤也无法形成。所以，对创伤事件的呈现或叙述是文化创伤形成的关键，比起对创伤事实的求证，创伤的叙说与再现是更为重要的环节。文化创伤确实离不开创伤性事件或事实，但这些突发的创伤性事件是创伤的土壤，而不是文化创伤本身，如果这些现象还没有通过特定的方式得到界定，就很难自动成为创伤。文化创伤是一个群体（如民族、国家等）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其集体身份、价值观和历史记忆受到严重打击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创伤。这种创伤不是个体层面的心理创伤，而是集体层面的文化心理冲击。历史上许多惨痛的灾难并没有成为社会层面的文化创伤，没有被历史和民众记住，没有成为民族的文化资源，原因复杂，但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叙说有关。将一场社会危机通过恰当的方式反复书写，使其成为影响集体或民族认同感的文化危机，这是叙说的目的。因为只有当群体成员感受到并认识到其身份认同面临危机时，文化创伤才会产生。因此，文化创伤对于强化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而文化创伤又离不开书写与符号。

二、抗战教科书与文化创伤书写

战争带来创伤，但创伤并不必然会成为文化创伤，有关战争的历史也并不能天然地成为民族文化、记忆和资源的一部分。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何其多也，能够成为民族文化、记忆和资源的能有多少。文化创伤需要被建构、被书写，并由一定的媒介所承载与传播。教科书被公认是一种绝佳的媒介，它信赖程度极高，受众面极广。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对抗，还是一段被教科书郑重书写的文化创伤，教科书书写抗战文化创伤，旨在塑造人们的文化观与价值观，最终指向人们的身份认同，这是超越时空限制、范围广阔、凝聚力强的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如前所述，文化创伤离不开叙说，离不开书写。抗日战争是一场惨烈的创伤，是中国人的肉体与心灵的创伤，也是中华民族的创伤。据官方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

上。^[6]战争期间，中国社会遭受剧烈冲击，有序的生活被创伤性事件所摧毁，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陷入焦虑、恐慌与愤怒。伴随着交往的中断与生命的终结而来的，是真相的破碎与断裂。死者无法复现日军的罪行，日军在一地犯下的罪行不易被另一地完整地理解。在这种背景下，记录创伤、记住创伤、传播创伤是反击的第一步，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只有以特定的形式保留受害者的经历，使其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国家、民族、社会的每个场景中、每个人心中，才有激发民众、记住灾难、奋起反击的可能。正因为这样，抗日战争应该是也确实是被大规模、持续性书写的文化创伤。在这一过程中，报纸、杂志、音乐、影视等大众媒介，尤其是海量教科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教科书是表征、叙说文化创伤的重要媒介，是书写、呈现、传播抗战时期创伤性事件的重要工具，它比绝大多数媒介拥有更强更权威的制造意义的能力。抗战教科书中有关国耻、国难尤其是中国军民牺牲精神的书写，铭刻了战争岁月的创伤符号与抗争印记，实现了从个体痛苦到集体创伤的文化转化。在书写与传播创伤事件的过程中，教科书的核心功能在于建构创伤的公共认知框架，通过选择性编码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经典战役、重要日期、伤亡数据等创伤符号，提出或强化文化创伤符号，对事件赋予意义并展开诠释，将具体的创伤事件转化为民族苦难与民族精神。这一过程促使战争中个体的经历升华为全民共同认知的意义，进而通过教科书决定学生应该记住什么、学习什么，向全社会昭示仇恨对象和行动方向，从而促进抗战文化创伤的形成，并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资源。

教科书对读者记忆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共时性维度，它借助标准化、权威性的知识传播，搭建记忆的社会框架，将东北流亡学生和西南大后方学生的离散记忆，整合为同质化的抗战共同体想象；二是在历时性维度，它通过代际传递形成记忆链，确保创伤记忆突破个体生命周期的局限，实现社会记忆的再生产。具体而言，作为反映在教育领域的全局性文化创伤过程，教科书书写创伤表现出独有的特征。首先，作为准官方知识的载体，教科书是国家意志的体

现，其创伤叙事必然受到一定的制度性规训。它需要将创伤事件转化为符合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教育知识，通过多重筛选机制，如内容的选择、设计等，剔除不符合国家叙事的创伤元素，形成标准化的历史书写模式。其次，相较于一般媒体追求创伤事件的快速、简洁地呈现，教科书遵循教育性与科学性的双重标准。它既注重援引权威材料证明创伤的真实性，采用符合科学规范的方式（教科书不敢也不会用今天某些电视剧中那么无厘头的消费抗战的素材），来揭露痛苦、受害者和抗争的本质；又满足育人性的要求，通过年级递进的内容编排，实现创伤记忆的进阶性再生产。再次，与一般媒介的多元阐释不同，无论是在官方意义上还是在传统文化意义上都被视为权威的教科书，往往通过知识标准与道德规训的确立，以及对国家、民族意志的遵循，避免创伤诠释过度发散。最后，较之一般媒介，教科书能够以更贴近读者接受能力与身心特点的方式呈现文化创伤，善于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转化为相对分明且易于理解、记诵与传播的价值判断。

这种发生于教育场域且反映全民族特有的创伤叙说机制，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化手段，将碎片化的、有时是个人化的记忆固化为文化记忆、集体记忆，从而构建出民族的、全民的文化创伤过程。这一过程是教育制度、意识形态、科学规范等多重力量的共同产物，最终形塑出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创伤叙事范式。

三、抗战教科书文化创伤书写的 value 意蕴与实现策略

“教科书具有动员大众、宣传抗战的独特功能。教科书对大众的影响力不如政治类文本来得猛烈，但它们的影响力更持久、更深远、更广泛。”^[7]民众的士气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精英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用教科书这一动员大众、提振士气的“利器”，上演了一出小课本促进民族统一抗战的历史大戏。

（一）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抗战教科书文化创伤书写的 basic 目标

抗日战争“实为民族战争”^[8]，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之战。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中共

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总目标之一就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发动民族革命抗战。19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指出，当前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9]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背景下，根据地和国统区教科书都迅速行动起来，大力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使用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全方位服务统一战线，促进各民族共同抗日。

战争带来的文化创伤会长时段地改变民族记忆，并对全民族成员的民族身份认同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而民族身份认同又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总是在建构中”^[10]。文化创伤之所以能影响民族认同，是因为在平静的生活中原本不那么凸显的民族身份意义，受到了战争创伤的冲击。家国破碎的风险对身份意义的挑战给人们带来了震惊与恐惧感，引发了文化危机、民族危机及全社会层面的创伤。个人创伤是对个人心理的猛烈一击，战争带来的文化创伤则是对全社会成员的猛烈一击，它危及社会联系的纽带、共同体意识与民族身份认同。日军侵华带来的是我国各民族群体共同经历的创伤，它伤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让所有人感到民族灭亡的危机。当创伤危及民族身份认同时，一种与身份认同相伴随的民众运动就不可阻挡了。一旦日本的侵华战争危及中华民族的独立时，民族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体都会产生相应的回应。此时，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创伤共享就意味着责任共享、使命共享。此时，对于教科书而言，教科书书写创伤的主要目的是发扬民族精神、陶铸民族意识，培养儿童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11]。其基本策略就是通过控诉日本罪行，使亲历了战争的师生因着相同的创伤经历而彼此理解，使非亲历战争的师生对创伤事件形成高度的心理与情感认同，进而强化人们的民族身份认同，达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强烈共识。

抗战时期的教科书如播种机，将“中华民族”的概念播撒开，将民族团结共同抗战的理念传播开。一旦文化创伤被教科书系统呈现并广泛传播后，受影响的群体在对创伤事件反复认知与体验的过程中，其共同体身份得以强化，同仇敌忾的氛围得以形成。永久性创伤记忆把受害者紧

密地维系在一起，实现了民族身份认同的升华。所以说，“伟大的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动员程度如此广泛，战斗意志如此顽强”^[12]。在这一意义上，教科书使战争的破坏力反向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强。

（二）抗战教科书文化创伤书写的主要策略

在战火岁月中，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独特的创伤经历。当个人和群体的创伤被教科书呈现，局面便会发生重大转变。不同的教科书文本通过体现学科性质的符号构建、反复叙说的课文叙事技巧，加之其海量读者和超级权威性，能够让广大民众共享相似的战争创伤记忆。经反复叙说，战争创伤凝练成永久的全民记忆符号，实现从创伤事件到文化创伤的跨越，达成促进民族身份认同的目的。

第一，抗战教科书通过构建“文本共同体”，协同发声，再现创伤事件，实现预期目标。作为存在于族群中的创伤记忆，其存续依赖成员的习得。若引发创伤的事件消逝后，群体没有习得相关记忆，就会导致记忆断裂与创伤遗忘。不同族群的创伤记忆若要跨越时空，成为民族的共同文化创伤并永久存续，就必须通过文字记述与符号化，使记忆外化让习得容易发生，进而实现创伤记忆的固定化与可回溯性，最终使其成为民族的精神遗产。不难理解，创伤事件及其衍生的个人叙述具有高度复杂性。这些叙述内容众多、观点各异，且受到时空和地域的限制。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个体记忆难以直接转化为集体记忆，进而成为文化创伤。因此，留存并传播民族文化创伤的共同记忆，第一步就是要通过文本使创伤记忆符号化、规范化，把分散的记忆整合为具有统一框架的集体叙事。一个合格的创伤呈现过程，必须回答以下问题：痛苦的性质、受害者的性质、责任归属及未来态度。^{[3][13-15]}抗战时期，在民族存亡的危机面前，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教科书，包括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及国统区教科书等，存大同求小异，构建了一个“文本共同体”。它们作为一个松散的整体，拥有大致统一的叙事框架，协同发声，成功回答了上述问题，较好地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民众身心中留下的创伤，转化

为整个民族的创伤记忆与精神遗产。

所谓教科书文本共同体，是指由共同主题、共同意义、共同目标的教科书实体文本构成的集合。它是将个体经历转化为共同符号，并从中凝聚出共享意义的产物。教科书文本共同体在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为特定社会中的个体提供了一套特定的知识、规范、信仰和价值观体系，让身处不同地域、时代且身份各异的个体，能够对其所处的文化社会环境形成相对一致的认识。抗战时期，根据地和国统区各种各样的教科书组成了一个庞大而松散的文本共同体，即抗战文本共同体。这些教科书在战争呈现和文化创伤构建方面主题近似、读者类似、目标一致。它们汇集了无数个体的独特的创伤事件和抗争事迹，共同凝聚出民族精神内核，成为塑造民族共同记忆、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媒介。

抗战时期，根据地与国统区的教科书文本共同体在内容选择与表述方式上体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一方面，它们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叙事框架，集中围绕为什么要抗战、谁来抗战、如何抗战及抗战将有什么样的结局等问题展开；另一方面，各种教科书相互参照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①突出。这种一致性不仅确保了叙述的统一性，也为文化创伤与抗战记忆的跨群体、跨地域传播提供了稳定的文本基础。它强化了广大百姓对于民族存亡的危机意识，增强了中国民众唇亡齿寒的团结精神，而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依存关系又反过来成为彼此分担创伤痛苦的重要支撑。

第二，抗战教科书运用叙事技巧，努力构建文化创伤的符号话语体系。文化创伤只有借助一定的叙事技巧，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叙述出来，才能更好地传承记忆，被人们所习得，进而形成记忆共同体。抗战时期的教科书文本共同体深谙此道，通过具象化文本、符号化转译与重复性传播，达成了“储存、激活和传达意义”的目标，初步凝练出跨越时空的抗战话语体系，构建了粗线条的符号系统，赢得了世界和平人士的同情、尊重与支持。

抗战教科书注重通过具象化文字储存与传播

抗战事迹。抗战动员依靠的绝不仅仅是简单、抽象的口号与宣言，亲身经历与典型事例更能深刻反映创伤、留存记忆并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当时，教科书中的许多课文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战争时期中国百姓典型的悲惨生活，取材真实且广泛。这类从个体视角切入，聚焦亲历者日常的叙事，借助感官细节与情感强度实现了创伤记忆的“在场化”呈现。其具身性叙事策略将已然发生的经验转化为可感知的“记忆场”，让学生通过情感共鸣完成记忆内化，最终实现行动外化，从而达到动员民众积极抗战的目的。

抗战教科书注重将复杂的抗战局面简化为象征符号，从而较好地实现记忆唤起与创伤传播。当时，一些教科书直接以“国防”“战时”命名，突出了大背景，彰显了“国防”与“战时”的独特性和符号影响力。“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变”“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日军”“汉奸”等符号在教科书中不断出现，成为集体记忆的支点，也成为我国抗日战争的代表性符号。这些符号承载着特殊意义，成为含义丰富且敏感的政治宣言。当这些符号从具体历史事件的代表升华为民族创伤的能指，当“九一八”被建构为国土沦丧的时空隐喻时，当东北失守与国耻紧密联系起来时，教科书便不再只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蕴含着收复东北的决心与复兴民族的情怀。

抗战教科书通过重复象征符号，实现抗战文化的巩固与传播。正如学者所强调的，文本本身不是传承的形式，只有当人们传播文本时，其意义才具有现时性。^[13]为了实现传播，教科书文本共同体不断重复抗战符号，为的是强调那些重复发生的、一般的及典型的东西，这些东西展现为一族族文化特质或属性。^[14]事实上，教科书本身就意味着传播。无传播，也就无教科书。在各类文本中，唯有教科书本质上是活性的，文化的激活需要的就是传播。无论版本、学段、学科如何，几乎每本涉及抗战的教科书都会不断复现这些符号，抗战意义也随着符号的不断传播而实现再生产。高密度的符号重复不仅出现在“国语”、

^① 所谓互文性，是指根据地教科书与国统区教科书具有多种多样的广泛复杂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相互参考又相互独立。

历史、地理课本中，连算术等理科课本也如此，《国防算术教科书》《战时常识教科书》《复兴自然教科书》都可以概括为“抗战教科书”，它们均在“抗战”这一主题下展开论述。抗战的名正了，抗战内容的言说也就顺了。“抗战”成为烽火十四年的压倒性文化和符号。

抗战教科书在文化创伤书写方面，还注意朗朗上口、便于传诵的特点，尤其是共产党根据地的教科书，具有农民性、农业性、农村性，能够最大程度地动员民众把抗战作为自己的切身担当，使文化创伤在广大民众中复现和铭记。^[15]

四、新时代教科书抗战书写的使命与担当

战争创伤不应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散。于惨痛的战争而言，“永不遗忘的铭记”才是正确的应对反应。“永不遗忘的铭记”不仅是对幸存者的一种疗伤，而且是对死难者应尽的精神和伦理义务^[16]，更是对未来和平的许诺、对后代安全的责任。教科书在“永不遗忘的铭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不能遗忘、需要铭记在心的内容千千万，但最重要的莫过于铸牢民族共同体和构建抗战话语，以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反思与行动，这便是今天和未来教科书持续书写抗战事件的使命与担当。

（一）不断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

抗战时期的教科书（甚至清末到民初的教科书）的基本特点是注重国耻叙事，所谓“国耻二字之不容不灌输于人人之脑中也”^[17]，力求以国耻激发学生的爱国心。济南惨案后，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中小学应特别注意国耻教材以唤起民族观念案》和《小学教材增加国耻教材案》。会议认为：“我国迭受外侮，民气日弱，欲强国保种，须唤起国民同仇敌忾”，并提出四条办法：“（一）国耻教材充分编入中小学教科书中；（二）学校遇有机会，即须宣传国耻事实，使知吾国第一仇敌是谁，思有以推翻之；（三）国耻图表必须设备，并使学生常有机会看见，触目惊心；（四）打倒第一国仇方法之研究，在学校中必须师生共同时研究之。”其中的“第一仇敌”指代日本。会议提出：“惟有将国耻事略、外交失败史、不平等条约，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之中国现况，列入教科

书中，俾一般青年男女咸存敌忾同仇、枕戈待旦之志。”^[18]这表明国耻教育在当时是教育的重心与主旨。

新时代教科书既要立足国耻，又不能局限于国耻，要将国耻叙事中心转变为民族复兴叙事中心。今日的教科书，需要持续呈现抗战创伤，让离抗战越来越久远的年轻人能够解码那段烽火岁月，铭记战争的残酷。但今天对抗战创伤的“铭记”，重心应放在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力上。如前所述，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遭受的巨大创伤，必须通过以教科书为主要媒介的记忆传承方式，代代相传，让不同地域、不同代际的中国人对这段历史形成共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从而形塑并强化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让人们深刻铭记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激发对和平的珍视及对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构建引领世界话语的中国抗战话语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话语体系一直体现出“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日本受害论”等错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观。^[19]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宣称，要不是美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人现在得说德语，可能还带点日语口音。^[20]这种傲慢的偏见，无疑是公然抹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英国历史学者米特（Mitter）说：“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早于英、法两国反法西斯战争两年之久，比美国参战早4年。”^[21]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曾表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你想想有多少个日本师团会跑到其他地区作战？澳大利亚、印度乃至中东，都会被日军攻占。^[22]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如果中国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23]中国抗日战争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但长时间的西方中心论漠视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作用，遮蔽了中华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光芒。不仅如此，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

受的创伤也难以成为撼动人心的人类苦难叙事。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血腥的屠杀，相较于“南京大屠杀”，犹太人对苦难的诉说遍布世界。尽管“纳粹屠犹”主要发生在欧洲，但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念馆与纪念碑遍布全球30个国家，“纳粹屠犹”已然成为全人类的创伤符号。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历史上令人发指的暴行，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成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遗忘的大屠杀”，并一度遭到日本政界的否认。^[24]

可见，即使发生过真实创伤，但如果沒有进行符号构建，或者沒有合适的符号构建，就难以形成社会性的文化创伤，人们也並不认同需要铭记这些创伤（实际上，很多人也许已经不怎么知道有这些导致创伤的事件发生，人们已经在忘记创伤），更不会因创伤而强化身份认同。因此，作为文化创伤书写的关键工具，作为传播抗战记忆、塑造抗战符号的核心载体和权威媒介，我国新时代教科书肩负着构建以“中国战场”为核心符号、以“南京大屠杀”为核心创伤、以“十四年抗战”为核心时间，包含“九一八”“一·二八”“七七”等标志性事件的抗战话语或符号体系的重任。要通过大规模、持续且有说服力地强化与传播这些符号，呈现中国抗战故事，打破国际认知壁垒，唤醒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认同与尊重。

（三）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思战争创伤

抗战创伤的铭记不应沦为怨恨与报复的工具。新时代教科书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引导学生对战争创伤与抗战记忆进行深刻反思，避免学生沦为狭隘民族主义的俘虏。“为永不遗忘而记忆”并不等于“为复仇而记忆”。的确，追求和平崛起不能遗忘战争；同理，实现民族复兴也绝不是为了报复。“记忆的责任指向普遍主义的正义，也就是在根本恶或者根本善的层面上去辨别是非、划清原则、构建秩序”^[25]，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教科书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建立基于正义与和平的逻辑思路，以高度的责任感驾驭教科书这一形塑思想、传播理念的利器，引领学生充分认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来之不易，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审视战争，并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未来中国乃至

世界发展的智慧。

战争创伤书写以历史往事为依据，但历史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往事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往事”。把受伤的民族情感引向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也许才是学生从教科书抗战文化创伤书写中应该汲取的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新时代教科书最重要的使命与担当。

参考文献：

- [1] BREUER J, FREUD S. Studies in hysteria [M].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6: 6.
- [2] 赫尔曼. 创伤与复原 [M]. 施宏达, 陈文琪,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5.
- [3] ALEXANDER J C, EYERMAN R, GIESEN B,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4] KAPLAN E A. Trauma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 [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32.
- [5] HAMBURGER A, HANCHEVA C, VOLKAN V D. Social trauma-an interdisciplinary textbook [M]. New York: Springer, 2021: 37.
- [6] 中国抗战部分数据首次公布[EB/OL].(2017-10-11)[2025-05-18]. <https://www.krzzjn.com/show-755-59080.html>.
- [7] 石鸥, 刘毕燕. 课本抗战之根据地《战时新课本》[J]. 中国教师, 2015 (18): 13-14.
- [8] 周志华, 殷小琴, 吴敏. 保卫大武汉: 纪念武汉抗战六十周年专辑 [J]. 武汉文史资料, 1998 (3): 249.
- [9] 毛泽东. 论新阶段 [J]. 解放, 1938 (57): 24.
- [10] 霍尔, 杜盖伊. 文化身份问题研究 [M]. 庞璃, 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3.
- [1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 (二): 抗日战争时期: 下册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6: 303.
- [12] 胡锦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05年9月3日) [N]. 人民日报, 2005-09-04 (2).
- [13] 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89.
- [14] 伯克.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 第2版 [M]. 姚朋, 周玉鹏, 胡秋红,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28.
- [15] 石鸥, 张文. 根据地教科书的精神遗产及其现代价值

- 值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7 (2): 24.
- [16] 阿斯曼, 陶东风, 王蜜. 记忆还是忘却: 处理创伤性历史的四种文化模式 [J]. 国外理论动态, 2017 (12): 89.
- [17] 侯鸿鉴. 改订教科书之臆说 [J]. 中华教育界, 1915 (8): 2.
- [18] 张研, 孙燕京. 民国史料丛刊 [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9: 157.
- [19] 王文, 鲁东红, 韩家修. 纠偏西方“二战史观”, 重塑中国“二战地位” [J]. 理论建设, 2025 (1): 1.
- [20] ROLL CALL. Speech: Donald Trump address U.S. service personnel at Al Udeid air base in qatar-May 15, 2025 [EB/OL]. (2025-05-15) [2025-05-18]. <https://rollcall.com/factbase/trump/transcript/>
- donald-trump-speech-us-troops-al-udeid-air-base-qatar-may-15-2025/.
- [21] 米特. 中国, 被遗忘的盟友: 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M]. 蒋永强, 陈逾前, 陈心心, 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5: 11.
- [22] ROOSEVELT E. As he saw it [M].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6: 53.
- [23] CHURCHILL W. The hinge of fate [M]. New York: RosettaBooks, LLC, 2002: 238.
- [24] 孙珂. 文化创伤认知及其价值 [J]. 河南社会科学, 2018 (12): 73.
- [25] 黄月琴. 大屠杀的事件性与后创伤主体: 记忆、媒介及其文化省思 [J]. 国际新闻界, 2019 (3): 163.

(责任编辑: 王 润)

Trauma Presentation in Textbook for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rough Textbook

Shi Ou, Jiang Yu

Abstract: Where there is war, there is trauma, but trauma does not necessarily become cultural trauma. Cultural trauma is a kind of trauma generated when a group's (such as a nation and country) collective identity, values and historical memory are severely hit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 Cultural trauma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and written and carried and spread by certain media. Textbook is recognized as an excellent medium. The basic goal of cultural trauma presentation in textbook for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s to promote the identity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main strategies are to reproduce traumatic events by constructing a text community and use narrative skills to construct a symbolic discourse system of cultural trauma.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esentation in the new era is to constantly enhance students'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trive to build a leading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a's war, and reflect on the war trauma based on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extbook; textbook for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ultural trauma; trauma presentation